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  
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  
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

# 救活农村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无论从人口上着想或经济上着想，惟有站在乡村的立场，重乡村，从乡村工作入手，复兴农村，才不会走错路子。

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的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到的幸福，我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

祝彦著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  
常常念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农民服务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

常常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救活农村』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回眸

● 祝彦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祝彦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211-05915-7

I. 救... II. 祝... III. 乡村建设—中国—民国—史料  
IV. D69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5827 号

##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JIUHUO NONGCUN”: MINGUO XIANGCUN JIANSHE YUNDONG HUIMOU

---

著 者：祝 彦

责任编辑：陈 姝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350003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5.50

插 页：2

字 数：241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978-7-211-05915-7

定 价：30.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前 言

近代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根据权威人士的估计，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力度的条件和能力；同时也指出，中国城乡差别在近 30 年来并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有学者形象地比喻道：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可见问题十分严峻。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中国 8 亿之多的农民的小康。因此，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出于对时代的正确把握，2005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以及 2008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

为了让今天的农村工作有所借鉴，笔者出于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责任，考察了 20 世纪初的一场针对农村问题的实验运动，供所有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士参考。尽管这场运动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毕竟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考察这场运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有些东西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启示作用的。当我们把眼光和学习经验的足迹伸展到异国（主要是韩国、日本及欧洲）时，却忘记了在并不算久远的历史上，我们的先贤曾进行过农村建设的实验，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

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抗日战争的爆发），民国时期的这场名为

##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救活农村”的运动最终以不成功结束。但如果不抱对历史苛求的态度，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很多可以供今天参考或者引以为戒的内容。

比如发展生产，无论是由国民政府官方主持的江宁实验，或者由地方政府阎锡山倡导的山西村政建设，还是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高阳主持的无锡实验、黄炎培主持的徐公桥实验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践，都把发展当地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他们主张通过办企业、鼓励发展副业生产、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进先进的农机具等措施，来实现实验区内农民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目标。

又比如为了消除存在于农民身上的不良习气，树立良好、文明的乡风，以上实验均把改良农村的陈规陋习作为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容，十分重视，下了大力气去做，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山西村政改革过程中推行禁烟、剪辫、放足；邹平实验通过“朝会”宣讲科学，反对吸毒、早婚等；定县实验通过实行“四大教育”消灭愚、穷、弱、私；无锡实验、徐公桥实验和江宁实验都把消灭农村的赌博之风、破除迷信等作为重点，使实验区内农民的精神面貌得到改善。

再比如为了使村容整洁，各实验区十分注意公益事业的建设 and 日常卫生的治理。针对农村交通不便的问题，有的实验区把帮助农村修桥补路作为一个重要任务；针对农村不注意公共卫生的问题，有的实验区修建公共厕所，并安排专人打扫等等。

为了实现民主式的管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实验得到农民的支持，无论是官方主办的实验还是由学者教育家主持的实验，都在实验区内建立了民主式的机构，如山西的村民会议、邹平的村学乡学、定县的公民服务团、无锡和徐公桥的乡村改进会等等。尽管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这些民主机构未必能够真正体现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但作为尝试和实验，这毕竟开了个头。

总之，如果说韩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农村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那么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建设实验，则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教训和经验都是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 目 录

导 论	1
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农村	1
二、“救活农村”的不同模式	11
<b>第一章 阎锡山与山西村制改革</b>	15
一、“山西王”阎锡山	15
二、用民政治	18
三、推行“六政三事”	26
四、改革村制	34
五、行政之本在于村	40
六、阎锡山喟叹：“我辈从前终日汗劳，真可谓白费 力三字”	48
<b>第二章 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b>	55
一、“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56
二、投身乡村建设的初衷	58
三、乡村建设的初步尝试	62
四、轰轰烈烈的邹平实验	67
五、梁漱溟感慨：“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76

##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b>第三章 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b> .....	83
一、“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	83
二、致力于民族再造 .....	87
三、定县模式 .....	97
四、晏阳初悟道：“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 .....	114
<b>第四章 高阳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及无锡实验</b> .....	122
一、民众教育家高阳 .....	122
二、从乡村工作入手，以复兴民族 .....	127
三、辅导地方自治 .....	132
四、传播农业科技，促进农村文明 .....	136
<b>第五章 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徐公桥实验</b> .....	140
一、职业教育家黄炎培 .....	140
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 .....	145
三、徐公桥实验 .....	150
四、实验成效 .....	163
<b>第六章 陶行知与乡村教育</b> .....	166
一、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	166
二、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 .....	168
三、晓庄模式 .....	181
四、“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 .....	190
<b>第七章 江宁县政建设</b> .....	193
一、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 .....	193
二、改革地方行政 .....	198
三、发展乡村教育 .....	202
四、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	207
五、复兴县域经济 .....	210
六、“用政府的力量，去推动乡村”的结果 .....	217

结 语.....	219
一、为何“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	220
二、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的现实启示.....	226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40



# 导 论

## 一、20 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农村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几个地方掀起了一场规模颇大、影响也不小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它的历史借鉴意义。这场在局部轰轰烈烈而又影响深远的“救活农村”、拯救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简单来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中尤以农村经济社会矛盾突出：体制混乱，农村治安不好，农业破产，农民生活处于挣扎的境地等等。此时，一批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和国内一些有识之士首先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进行了这场“先知先觉”的运动。

那么，造成中国农村社会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在经济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损坏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国民党南京政权的性质，实质上是代表了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因此，该政权在对内政策上就旨在维护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历代剥削阶级统治一样，封建地主阶级也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柱。许多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在政权的建立与运行过程中，许多官吏又成为新兴的地主，使这一阶级得以膨胀。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等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中指出：1928 年至 1933 年，河南辉县的地主户数占全体农村户数的比例由 4.1% 增长到 4.4%，浙江龙游的地主由 6.6% 增到 7.2%，广西桂林的地主由 1.9% 增到 2.4%。地主不仅没有资本家化，反而走上了国民党新军阀化之路，如 1930 年江苏北部共有大地主 213 户，而其中身为军政官吏者竟达 122 户，占总户数的 57.3%。与此同时，贫雇农的户数

##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也不断增长，这就说明农村封建关系在扩大。这些新兴地主仗着手中有权，甚至手中有枪杆子，肆意侵占农民利益。据江苏省民政厅 1928 年至 1934 年间的统计，该省拥有 1000 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 374 个，其中有 77 个是国民党的官吏。1931 年，在无锡被调查的 104 个村长中，91.3% 为地主，7.7% 为富农。这种状况，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据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29 年在无锡对 20 个村 1035 户的土地占有情况所作的调查，地主占总户数的 5.7%，占有土地总数的 47.3%；富农占总户数的 5.6%，占有土地总数的 17.7%；而占总户数 88.7% 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仅占有土地总数的 35%。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1930 年 6 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土地法》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地租从未因此而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断增加。如广东省，从 1929 年到 1934 年，租额普遍增加了 20%。<sup>①</sup>

由于在帮助南京政权建立的过程中，买办资产阶级尤其是江浙财阀出了大力气，因此南京政权以“报答”的方式处处维护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许多买办资本家从经营公债中就得到了大量的好处。据统计，上海 28 家主要银行的总资产，1926 年为 13.91 亿元，1931 年增长到 25.696 亿元。1928 年，上海银钱业投资公债为 1.3 亿元，1931 年则达到 2.3 亿元。

与此同时，南京政权内部一批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亦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超负荷的榨取和掠夺，肆意占有和支配国家财产，逐渐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以公债掠夺为例，从 1927 年到 1936 年，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 26 亿元公债。这些公债的大部分由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而以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这些公债的发行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愈多，人民群众的捐税负担就愈重。1934 年，江苏省田赋附加税达 147 种，其中有的超过正税 25 倍；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 61 种，其中有的为正税的 80 余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关税、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8 页。

盐税和统税所占的比重，1928年为48%，1931年增至88.2%。<sup>①</sup>

由此可见，国民党南京政权不可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相反为了维系其与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关系，便纵容他们进一步侵占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村经济的破落。

其次，封建统治者的残忍掠夺，造成了大量农民家庭破产，对农村经济起到了直接的破坏作用。

地租剥削仍然是封建势力压迫农民的主要形式，而且封建地租剥削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对此，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33年前后，山西省的棉田每亩租额由原来的2元提高到10元，增长了400%；江苏宝山县1923年每亩租额为2.5元，到1933年就提高到9元，增长了260%；广东台山县1927年每亩租额为20元，到1933年就提高到30元，增长了50%。在国民党南京政权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地主阶级集团通过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方式，加紧对农民的剥削。为了攫取最大利益，地租剥削是非常重要的，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当时，实物地租的租额一般是收获物的一半，甚至高达70%~80%。

在沿海产棉区，实物地租以棉花的形式交给地主，每亩从38斤到70斤不等，而地租率平均也在50%以上，最低为44%，最高为78%。

全国其他地区也基本一样。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30年代，江西全省68个县，除萍乡、梓山、铜陵、分宜、宜春、寻乌等6个县不详外，其他62个县的实物地租额和收获量比率为：不满50%的12个县，占62个县的19%；50%以上70%以下的43个县，占62个县的69%；70%以上的6个县，占62个县的9.7%。另据抗战前四川等8个省的调查材料，实物定额地租占收获量80%以上的，四川新繁为85.7%，云南昆明为88%，湖南衡山为86.7%，湖南永明为80%。甚至租额有占收获量100%以上的，如浙江义乌为121.2%，福建长汀为100%。

如此看来，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不仅没有收获，还须倒贴，由此可见地租剥削之重！农民在这种重压下，生活的艰难亦可想而知。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第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处于恶劣的境地。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为显示对主权的争取，从1928年6月起，就大力宣传要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发起了一场同外国列强“改定新约”的运动。尽管在这个运动中，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收回了镇江、厦门、威海等租界，但它“改定新约”的主要内容仅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在关税自主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美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等12个国家缔结关于关税问题的新条约，使海关税率有所提高。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海关税率时仍要受这些国家的约束，并且中国的海关行政权仍然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与旧条约期满的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等国订立了新条约。但是，由于日本和英、美、法等国反对废除领事裁判权，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在1931年5月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却未能真正实行。中国经济和政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由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曾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有利于它们的经济政策。以外国在华投资设厂为例，1927年以后明显增多。在产业方面，1931年，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2%；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纱锭数占中外厂纱锭总数的43.5%，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布机数占中外厂布机总数的51.4%。在交通方面，1930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82.8%；1931年，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里程总数的84.3%。在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2.67多亿元，而英国在中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四家银行的总资本就达1.1亿多美元（约合当时华币4亿余元）。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而美国在中国的花旗银行的存款就达13亿美元（约合当时华币近50亿元）。<sup>①</sup>由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对它们的依赖性更大了。而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下，中国经济尤其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农民生活处于挣扎的边缘。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纵容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倾销廉价的农产品，其结果是使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的中国小农经济遭受沉痛打击。

1929年后，米、小麦、面粉和棉花这四种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农产品的输入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米、小麦最多时各达到2000万担以上，面粉达到1100多万担，棉花达到460多万担。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不惜以政治手段，通过贷款的方式极力向中国倾销剩余农产品。<sup>①</sup>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机械化程度高，且一般采取农场经营的方式，生产力比较发达，其生产成本远远低于仍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的中国，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又给予洋米进口免税优待，因此洋米的价格要比本国米的价格便宜许多。据1928—1933年上海市场统计，洋米价格比国米价格每担要便宜0.13~0.92元。这样一来，大量外国农产品的输入，就必然严重冲击中国农产品市场。

由于在质量和价格上进口大米和本国大米存在很大差距，前者质优价廉，消费者自然而然选择了进口大米，于是就出现了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中描述的结果：洋米很快就“几乎完全霸占了中国的市场”。在这种市场倾向的冲击下，国产大米的价格只能一路下跌。对此状况，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中有详细统计数字：如南京、湖南等地的米价在1933—1934年跌落到每石5元以下，而这一价格仅及生产成本的50%（每生产1石米成本大约10元）。广东1932年晚稻新米一入市，就因洋米已占据市场，价格一路下跌，每石米比往年要少卖1~2元，跌落幅度高达15%~25%。福建漳浦是著名的产米县，农民收入全靠输出稻米。但1933年受洋米倾销的影响，不仅外销之路被堵死，就是本埠市场也被洋米占领，致使米价大

---

<sup>①</sup> 郑大华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落，农民手中的粮食卖不出去，生计受到严重影响。江西米价在洋米的冲击下每石价格始终在3元上下，1933年更跌至2元左右，农民深受其苦。不仅如此，钱俊瑞发表在《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上的《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一文还分析指出：其他国产农产品，如小麦、棉花等，在外国同类产品的冲击下，其价格也是一跌再跌。国外廉价农产品已变成中国土产致命的威胁。可见仅是农业方面，西方国家对民族产业的冲击，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挤压下，中国农产品价格一路跌落，农民收入也就不断减少，农民即使丰产也不能丰收。《多收了三五斗》、《春蚕》、《丰收》等文学作品均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出现的“丰收成灾”这一现实。

第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农民负担沉重。

田赋是国家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是旧中国历代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民国时期的田赋不仅没有减少的趋势，税额反而不断增长，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增长更为迅速，原因是各方面财政支出都向农民伸手。1934年何会源在《独立评论》第89号上发表《论田赋增加》一文指出：自民元以来，特别自十六年以来……赋税随着新政一天一天的加多。例如办党要钱，办自治要钱，修路修衙门要钱，甚至复兴农村也要钱，这些钱只好尽先向农民要。名目繁多的摊派使得农民的负担不断增加，徐正学在其《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以陕北绥德县第五区为例，进行调查得出以下统计数据：当地220户农民仅负担摊入地亩的苛捐杂税，1930年即为8321.8元，每户平均37.83元；1931年7252.95元，每户平均32.97元；1932年9353.6元，每户平均42.52元；1933年1—7月5668.56元，每户平均32.577元。

除田赋外，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税种。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按种类大致可以划分为国税、省税和地方捐三种。国税即中央政府收入的税，主要有盐税、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卷烟统税、印花税等；省税即各省政府收入的税，主要有契税、牲畜花税、屠宰税等；地方捐即各县政府收入的捐税。据中华平民教育会对河北定县的赋税调查，全县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1927年为653115.662元，当时该县总人口为40万左右，

平均每人约 1.63 元；1928 年为 519149.863 元，平均每人约 1.3 元；1929 年为 493623.599 元，平均每人约 1.23 元。<sup>①</sup>

还有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高利贷资本在中国早就存在，但在民国时期，尤其是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由于农民普遍入不敷出，需要借贷，而农村金融又日益枯竭，高利贷资本便乘机猖獗起来，使本来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因高利贷的盘剥而更加穷困，甚至出现了为借高利贷而“典妻”（郁达夫的小说描述）的人间悲剧。因此，正如徐正学在《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分析指出的，高利贷资本的猖獗既是农村经济衰落的表现，又是促成农村崩溃的原因之一。

第五，天灾人祸有增无已，使抗灾荒能力极差的农村几乎陷于绝境。

中国疆域辽阔，东西南北地质结构和气候环境不同。由于这种客观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由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官场政治腐败，再加上连年军阀战乱，使本来就脆弱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河道淤塞甚至改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更加频仍，灾情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据 1937 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1928 年，全国有 1093 个县受灾，灾民达 7000 万人以上；1930 年，受灾县 517 个，灾民达 2100 万人以上。从 1928 年到 1930 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 1000 万。1931 年又发生严重水灾，湘、皖、鄂、豫、苏、赣等 16 个省的灾民至少在 5000 万人以上，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生活极为痛苦。<sup>②</sup>

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李文海等经过细致考证，编制了一张 1931 年水灾中 8 个受重灾的省区的损失概况表，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场洪水所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

---

① 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33 年版，第 573—575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8 页。

**“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八省水灾情况统计 (1931年)

省名	县数 (个)		人口 (万人)		农田 (万亩)		死亡人口 (人)	经济损失 (万元)
	总县数	被灾县数	总人口	被灾人口	总农田	被灾农田		
安徽	61	48	2171	1070	4880	3297	112288	38346
湖北	70	46	2670	956	6100	2360	65854	51843
湖南	76	66	3150	636	4660	1180	54837	36400
江苏	61	35	3412	887	9170	3670	89360	53100
浙江	75	40	2064	277	4220	800	329	6100
江西	82	37	2032	202	4160	940	7227	8500 (赣北沿江各县)
河南	110	84	3056	897	11300	3015	85604	29960
山东	107	30	2867	386	11070	1400	7000	4100
合计	642	386	21422	5311	55560	16662	422499	228349

在灾害的打击下，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进行流亡。

除了水灾，还有其他自然灾害。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有及时的记载报道。

如旱灾，当时的媒体有令人心寒的生动报道。1928年2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载：

据济南消息，直鲁两省灾况非常严重，当地灾民多有出售住屋及日用家具、转购食物燃料者。避灾东三省者，日益增多，据鲁省华洋义赈会一特派调查员称，彼访察各地居民，有十分之六已移至东三省或附近区域；未移居者，则十分之三因病不能兴也。鲁省西部各区农田均未种冬麦，牲畜缺乏、盗贼众多，小孩悉被遗弃于田间道上。有一教士云，每日必有人将小孩携至余处，余诚不知如何以活。又温漳地方一教士云，此间大旱，五谷皆不能生。……今又大旱，益令民不聊生，略有钱财者，早已避居他乡。去年十二月初，此间二十余村中至少有千二百人无食，孩童多有出售者，女孩每名仅售五元。

还有雪灾。天津《大公报》1930年1月4日报道了其害：

此间大雪期间，西安省城内发生惨剧两起。(一)巧(十八



日)晚有流亡灾民某氏,有子在襁褓中,婴孩因冻饿交迫啼哭甚急,母以生存无望,夜深时将子活埋深雪中,其母亦于次日冻死。(二)皓(十九日)晚于南门之大湘子庙街赵松坪家门前,缢死一无名男人,着青布棉衣,貌似商人之破产者。虽经公安局多方侦察,无从探悉该死者之来历籍贯。此外灾民之种种惨状,言之心酸。再日来天气严寒异常,水井亦结坚冰,屋内温度降至华氏表二十度。树上乌鸦麻雀一因气候严寒、二因遍地积雪无从觅食,往往坠地而死。灾民之困苦情状,实更有其于飞鸟者百倍。据老年人云,自光绪二十一年以来未有如此之冷者。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那就是军阀混战和土匪横行乡村,掳掠百姓,给民众造成极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虽然表面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实质上仍然是各地军阀独霸一方。为了争夺利益,动不动就大动干戈,挑起战火。最终是涂炭生灵,百姓遭殃。根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的《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一书资料,1927年至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大者就有如下几次:宁汉战争(1927年10月—1928年1月),粤桂战争(1927年11月—12月),蒋、桂、冯、阎四派联合反对张作霖的战争(1928年2月),蒋桂战争(1929年3月),蒋冯战争(1929年10月),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29年12月—1930年1月),蒋冯阎大战(1930年4月—11月)。国民党新军阀进行的混战,其次数的频繁和规模的巨大,远远超过北洋军阀时代。据统计:1912—1928年北洋军阀共有11次内战,时间总计为885天;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以前的10年间,内战进行了3650天。在战争规模上,北洋军阀最大的一次混战——奉直二次战争,动员也不过几十万人,战区也仅是三四个省份;蒋介石动员人数往往以百万计,且时常在同一时期内在几个战场举行几场战争,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也远远超过北洋军阀时代。除上述大军阀的混战之外,还有各小军阀的混战,如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贵州的毛(光翔)王(家烈)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等。

军阀混战,被称为兵灾。上海《申报》1930年1月6日报道:

灵宝密接函关,有无战事,莫不据为要害,鼓自民元以